

春雨潇潇怀故人

这年春天，正是细雨霏霏的时节，到处是湿漉漉的，难得出门，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山西的信。

× ×伯伯：

恕我冒昧，给素未谋面的您写这样一封信。我爸爸舒中桂生前经常提到您是他的好友，可惜您自 1957 年之后，下落不明，他始终没能与您联系上。而在明媚的春光降临人间时，他却已经离开人世了。他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，以“特嫌”而被监禁，在狱中不幸罹病逝世的。

父亲生前念念不忘与您的交情。作为他的女儿，我希望能为您传递一点他生前的信息，也希望能听到一些有关他过去的经历（他性格内向，从来不在儿女面前多说自己的情况，以致我们对他知道得太少）。

妈原来在一个研究所工作，现在退休了。她让我向您问好！
祝

健康幸福

× × ×
1980.3.15

我拿着信纸的手，不禁有点颤抖。数十年不见，谁想到这位挚友却再也见不着了。往事历历，闪过眼前。

认识中桂，那是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事。那时，我在马来亚槟榔屿的《现代日报》任记者。首次到槟城总工会去采访，便认识了他。跟许多侨生一样，他长得粗壮、矮墩，一头乌黑的密发向上梳。黑黑的圆脸庞，因为近视，眼球有点突出，显得很明亮。除了工作的时候，他不愿戴近视眼镜，常常因此而在咫尺内认不出人，人们都以为他很孤傲，不愿与人招呼。事实却是一经交往，您便会发现他富于年轻人的热情。他祖籍闽南，按这里的习惯，平日常讲的是普通话。战前他就在这里念完了华文中学，后来继续在一家英文学校读到九号位（相当于中学）毕业。

中桂担任的是总工会的秘书。工会的会员既有汉人，又有相当数量的印度人，他平日除了起草文件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当口头翻译。工会的华人与印度人副主席通话，他要翻译；遇到重要集会，中印工人都参加，更得由他将重要讲话译成英语，然后再由印度人副主席翻成印度语。像这样的情况在马来亚这个多民族的社会是并不奇怪的，中桂干这样的工作自然很繁琐，但他却受到普遍的尊敬。

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任务，那就是应付殖民地政府 CID（殖民政府的政治处）派来的特务。殖民地政府对工会的一切都异常注意，CID派了一名官员经常到工会来了解情况。这个官员讲英语，自然只有找中桂。据工会的主席告诉我，中桂颇有急才，经常编了一套谎言欺骗那位官员。有一回码头工人因工资不合理，决定罢工，中桂不让 CID 事先掌握情况，有意瞒过他们，罢工发生后，据说那个官员因而被撤了

差。后来再派了一个混血儿名叫杰克的到工会来窜门，中桂居然与他交上朋友，还由他手中弄到不少情报，这是后话了。可他断断没想到，数十年后，这竟构成了他“特嫌”的罪名，使他锒铛入狱。

中桂平日喜欢阅读文学作品，于是我们之间有了共同语言。为海明威《战地钟声》描写游击队员恋爱生活的片段，我们可以争论半天；为福楼拜《包华荔夫人》中有关乡镇生活的某些描写，我们会津津有味地谈好些时辰；加上因为彼此都很年青，又是单身汉，没有家人在身边，我们就接触得更频繁。有段时间甚至一起在一家小食店搭食。

每逢假日或黄昏饭后，我们都一块骑车到关仔角或登升旗山散步、郊游。友情就如积雪那样愈积愈厚，真是“结交在相知，骨肉何必亲”。

那时候在槟城这个只有不到十万人人口的城市，华文书店的书籍靠中国运去，数量不多，好书就更少。我们常去的一家书店叫时代书店，偶然有些好书，都争相购阅，或者买回来，相互交换阅读。记得有本罗曼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，店内只剩壹本，他买回来后立即送到我在南华街的住处说：“我最近忙着别的事，还是你先看吧！”我买了套坊间印刷的质量很差的《红楼梦》，中桂二话没说便先拿回住所去读了。

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几个青年朋友建议搞个英文补习班，由中桂来授课。尽管他很忙，还是一口应允了。每周义务授三晚课，还要改作业，这可真难倒了他，累得他后来星期假日也没闲功夫去郊游，而要为学生们改作业。凭着一股热情，他居然把《汤姆叔叔的小屋》这样的小说，莫泊桑的《金项链》英译本作为课文来教。由于班上的同学水平参差

不齐，后来一些跟不上的人不再来上课，这个英文补习班终于在办了一年半之后停课。

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青年组织了一个“新地文艺社”，并在《现代日报》借得版位，每半月出版一次《新地》副刊。中桂又成了热心的撰稿人，他翻译了一些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。可惜他的文字偏于直译，读起来就有点佶屈聱牙，我跟他讲了讲，他就停下来不再做这吃力的工作了，只偶尔写点散文随笔发表。

1948年中，中桂弄到了一个情报，说是殖民政府很快就要颁布紧急法令，进步团体都要被封闭，将予逮捕的进步人士名单据说也已拟定。他准备离开这个小岛了，我也打算动身到南马的新加坡去。临别，他给我送来了一套《辞海》与一本《鲁迅语录》（宋云彬编）。说起这套《辞海》还有一段古哩！槟城的书店都很少工具书出售，中桂有天在街头旧书摊发现有人卖中华书局印行的《辞海》丙种本，尽管索价要十五元，他还是毫不吝惜地买下了。我经常到他的住处去翻阅《辞海》，以解读古文的一些疑难，他知道我为了买不到这样一套工具书甚感遗憾，趁这回离别，遂以此相赠，由此也可看到他的隆情厚谊了。从这以后，正应了汉代那首无名氏的诗说的：“良友远别离，各在天一方”了。

解放后的第二年，我在广州，有天突然接到中桂的电话，真有点愕然。想不到相隔几年，又走到一块来了。他在电话里告知我自己因患肺结核，正住在伍汉持医院治疗，让我去看他。

我赶到医院去，见到病榻上的他，显然瘦多了，脸色有点清癯。

“总算盼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，盼到了全国的解放。”他的泪水浮上了眼眶。显然革命胜利给予他的喜悦是太多了，他不得不为此激动不已。“将来该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呵！”

谈到这几年留在马来亚的情况，他淡淡地摇了摇头：“一切苦难都过去了！”正如以往那样，对过去的事他仍然是沉默多于言谈。除了病情，他只简单地告诉了我几个朋友的情况。

在养病半年后，中桂出了院，到报社找我，说是要到北京去，欠点钱，我给他凑了点钱，他高兴地走了。以后，也曾接过他的来信，开始似乎是在学习，后来到了一个研究所工作，实在忙，信也不大写了。他就是那样一个人，埋头于工作，便什么也顾不上了。

一别数十年，没想到他已离开了人世。他与我那段友情竟有劳他的亲人来“接续”。我颇为激动地写了封复信给他的女儿，嘱她有机会到广州来时务必到我家来。

第二年春天，小舒果然趁出差之便到广州看我来了。见到亡友的女儿，我心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她的长相、谈吐都有点像中桂。我很难满足她有关了解父亲生前事迹的愿望，关于中桂，我知道的也确实太少。

“您爸爸的最大特点是不愿讲过去，不愿炫耀自己。尽管我们有深厚交情，关于他的出身等等以及后来的经历，我都不清楚。甚至他怎么由马来西亚跑回国内的，他也不愿多说，我只知道他是因患了肺病而回国内治疗的。”我只能如实地对小舒说，尽管她有点失望。

“他有几个同学与战友在这里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让你去与他们谈谈吧！”我补充说。

跟着，她告诉了我，她爸爸是在 1956 年才结婚的，那时候他在北京一个钢铁研究所工作。

“他怎么搞钢铁去了？”我有点奇怪。

“他是在研究所搞资料翻译。”小舒很沉静地说：“我是 1957 年生的，后边还有个弟弟。他有你这样一个挚友，也是妈说的。妈对他似乎也知道得不多，但我们都相信他是个专心致志，努力工作的好人”。

谈起中桂生前最后的日子，小舒呜咽地说：“……谁会想到在那场动乱中，造反派却要他交代自己的外国特务罪行。他怎么声辩自己一生追求革命进步都不管用，理由是他在槟城总工会工作期间与殖民政府 CID 的特务官员混在一起。爸爸说，那是为了应付他们，也向他们那里探听一些情报。造反派的逻辑却是敌人哪有那么容易提供情报给你，显然你是参加了特务组织，也给他们提供了情报，最后还把你派到中国来……不由分说，就是拳脚相加，之后便以“特嫌”而被拘留。……在狱中度过两年，肺病复发没得到很好的治疗，他就这样撒手人间了。直到 1978 年，始给他平反。”

“嗨！”我忍着泪水，叹息了一声。

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中桂的一生，尽管连他的家人知道得都不多，但我坚信他是过得非常充实而没有留下任何空白的，对这个世界，他作了默默的奉献。而世界上不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他那样的人，才构成了真、善、美的一面么？

小舒在广州呆了几天，好像并没有收集到多少有关她父

亲的资料。临走时，她又一次到了我的家。我把那套三十多年前中桂送给我又几经旧书店装裱过的《辞海》，连同一张我与中桂在槟城极乐寺照的照片取出来，送了给她，让她作为纪念品。她只把那张照片收下，而留下了那套《辞海》，感动地说：“这套《辞海》您带在身边数十年，还是留给您作永远的纪念吧！”

外面，雨落得很大。我的眼眶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浮上了泪水……”

1992年

悠悠慈母情

数十年间，那已经逝去的中秋，留给我的既有温馨的回忆，也有酸涩的印痕。

壬申年中秋，恰逢母亲辞世三十年。母亲生前予我的可以说太多太多。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（孟郊）。此时此地，不能不勾起我对她的悠悠思绪。

兴许是身处异域的缘故吧，母亲似乎把中秋佳节看得比其他节日重要。记得我们小时，每年中秋，她都要张罗一番，让孩子们与跟前的亲人好好聚一聚。即使我们长大了外出谋生，佳节来临时，她也没忘记捎信要我们回家团圆。只要可能，我们都没让她失望。她打从年青时随着父亲漂洋过海到印尼，辗转又到马来亚北部的G镇定居起，不知盼了多少个中秋要返唐山与亲人团聚，终因一生坎坷，贫穷如洗，这个梦没能实现。

父亲早逝，四十左右，母亲就开始守寡，靠给人洗衣度日，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可每年的中秋节，她还是操持得像像样样的。团圆饭该有的肴饌中，她最拿手的怕就是制作象征团圆的猪肉丸（在客家话中，丸圆是谐音字）。下足了味的猪肉丸，一颗颗在蒸盘里，油腻腻、香喷喷的，真叫孩子

们馋涎欲滴；每颗肉丸顶上盖着个小冬菇，使得整盘肉丸就像盖子下不愿露面的小“精灵”，大大增加了孩子们的食欲。等到大家津津有味地吃完这餐饭，母亲似乎也得到了最大的满足。

佳节晚上，当地的华侨几乎与国内一样，作兴让孩子们持各种纸扎灯笼游街。灯笼费钱，点过一晚就没用了，母亲舍不得买这玩艺儿，只让我们在居处赏月。她在天井旁或矮楼的天台上将一张小圆桌张开，摆着盛满槟榔芋、香蕉、袖子、花生、月饼的碟子，偶然也摆上几块柿饼，这柿饼是由国内运到海外的，显得特别珍贵。赏月前，母亲总不让孩子们乱动，得由她给月娘娘上过香，磕过头，嘴里小声地念过祷词，方才让大家围着圆桌尝月饼吃水果。毕竟因为穷，月饼是一个切成四块分开吃的，孩子们总觉得没有充分满足，可那赏月的气氛一点也不受影响。

“月光光，照地堂。骑白马、过莲塘……”。孩子们欢快地唱着儿歌。母亲这时候显得特别高兴，照例要给我们讲讲她在家乡过中秋节的故事。她会把妈妈腌制的酸菜怎么爽脆好吃；外婆家的土地庙香火怎么盛，求签怎么灵验讲个没完没了。尽管这些故事她已讲过多遍，我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。仿佛这是发生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的事，这些事又似乎都带上点神秘色彩，留在孩子们心中。

母亲在海外度过了四十多个中秋，与我们分开的时间要比团聚的时间多。长大之后，我们或到外边读书，或到外地谋生，见她的机会少了，可她对我们兄妹的炽热的母爱却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怀。记得有回由外地返家过中秋节，团圆饭中竟然多了我自小喜欢吃的马铃薯烧肉与菜心牛肉汤，吃

着吃着我不禁热泪盈眶。晚上快休息时，母亲又给我送来一双新买的素来喜穿的霸打（Bata）牌白球鞋，使我整晚都难以成眠。呵！母亲对我们兄妹的一切观察得是那么细，那么体贴入微。我们何以为报呵？

日寇侵略马来亚的头年，我在离家不太远的T城由于日寇进行大肃清而被逮捕，消息传到家里，母亲不知道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，额上的皱纹也不知增添了几许。她把仅有的一点首饰都典当掉，拿去作疏通费。半年之后，我出狱回家，正好遇上中秋节，那餐团圆饭，母亲喜极，簌簌地掉了许多眼泪。赏月时，尽管那年头什么都缺，她还是非常郑重地给月娘娘上香，磕头磕个不停，她的祷词中我分明听到她把我的出狱当是月娘娘的保佑所致。没有文化的母亲，平日经常为儿女们到G镇的一个观音庙去上香祷告，在她模模糊糊的认识中，似乎把“救苦救难”的观音大菩萨与月娘娘混在一起了，这个晚上对月娘娘的跪拜因而显得特别虔诚。听着她念念有词，我似乎触摸到了她那颗把儿女视作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心。

那以后没多久，我又离家远行了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可以想像她又将如何为我耽惊受怕，如何熬过多少失眠的夜晚。由于怕牵连家里，我一直没给家里写信。后来听妹妹说，她月月都到观音庙去上香为我作祷告，常常半夜梦回喊着我……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中秋，我赶回家里，见到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母亲，由于受职业病关节炎的折腾，她苍老多了，添了不知几许白发，脸上爬满了皱纹。为了儿子们能与她重聚，她特别高兴。吃团圆饭时，她接连喝了几杯自酿的糯米酒，直到有点微醺方止……

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，我与哥哥都相继回国了，母亲还是在老地方与妹妹过日子。解放后第三年，我们才把她接回广州。这时的她已是 60 多岁高龄了，受尽生活的磨难，她的身体已大不如前，又患有多种疾病。虽然她还念叨着要回粤东的大埔去与同辈的亲人聚一聚，我们以她无奈路途的劳顿而没有满足她的要求。

母亲总算回到唐山度过了 10 个春秋。1962 年中秋前夕，她终于撒手西归了。这时候，我正在农村接受改造，这使她蒙受了不少痛苦。而没能与儿孙们一块过这年的中秋节，我想她是会带着不少遗憾离去的。

1992 年中秋节前

守 护 神

结婚数十年，分开的时候竟比合在一起的时候多，说起来真有点辛酸。那年确是不幸中之幸，妻那因长期看显微镜而招致的颈骨增生症带来偏头痛，迫使她不能不从大学的讲坛上退下来了。

从此，家里总算有了个关前顾后的女主人，家定会像个家了。

对自己的身体，她倒是蛮乐观的。退下来后，她就积极进行治疗，做气功，加强锻炼，终于使身体有了转机。

家里最明显的转变是阳台上的盆栽从了无生气一下子变得生机蓬勃。今年栽上籐杜鹃、金银花、茉莉，次年又增加了绿萝、万年青、风雨花、铁蝴蝶……。狭长的花槽长着毛冬青，随风摇曳；莛萝纤细的藤蔓与金银花粗壮的枝梢则在花架上摇头摆脑，展示了无比的生意。

孩子与媳妇找了新住处搬迁之后，妻显得更忙碌了。门窗只要有点尘埃，她就要把它抹得锃光透亮；窗帘、门帘更是勤于洗换，显得干干净净的。冬天，换洗床被，按时晾晒床单、褥子、毛毯；夏天拆洗毛衣、棉衣，这些在过去她没功夫也懒得去干的事如今都干得井井有条。平日，三几天就

要将地板拖一过。看她实在太累，我劝她把节奏放慢些，她却不同意，蛮有道理地说：“家务是经常性的，你拖一拖，许多事就不用做了。这家还成家么？”

我担心她累出病来，建议雇个计时保姆。

“现在的保姆，肯给你做那么多琐务吗？再说，能物色个好保姆也不易，经常是带来许多麻烦的问题。”

雇保姆的事就这样搁浅，她依然是那样忙。

年青时总感到她心目中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，待她开始操持家务后，我才发现她在许多事情上想得很周详，显示了女性的细腻。

我出差的机会不多，可每回出差，她都给准备得妥妥贴贴。该用的毛巾、衣物，她都收拾好放进行李袋，小件的东西如须刨等总用小塑料袋装好，甚至一盒驱风油、一些急用药品她都不会漏掉。收拾好后，照例开列张清单，让我易于查找。

有回，要去韶关市，正是秋冬之交。出门之前，她连毛衣、毛布裤都给我装进了行李袋，弄得袋子涨鼓鼓的。

“天还不冷，不带冬天的衣物了吧！”

“您还不知道自己的体质么？一遇冷就三天两头伤风感冒，跟着便是支气管炎。粤北较冷，有备无患。反正行李袋都有小车轮，提不起可拖着走，别为此犯愁。”她倒是理由十足地讲得你不能不信服。

知道我有读书癖，临出门她又把一本刚到的《新华文摘》往那鼓鼓囊囊的行李包一塞。“旅途较累，就少看点书报杂志，晚上早点歇吧！”她叮咛着。

在韶关市办完了事，几个朋友相约到仁化丹霞山去一

游。那晚，在半山腰的旅舍歇宿，准备次日天未亮登山观日出。半夜，天气突变，呼啸的寒风掀动了旅舍的门窗，真是冬意凛然，我忙在行李袋中找出毛衣穿上，黎明前登山时在呼呼的北风劲吹下更把毛布裤也穿上了。此刻，心里陡地生起了一股暖意，心想要不是妻有预见，这回也许可得病倒在旅途中咧！

那以后不久，我们到桂林去旅行。出发前，她说：“桂林是旅游点，出入宾客多。我前年到那里时，总感到卫生条件差，看来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她上了一趟街，买回来消毒酒精，搞了一些小棉团，泡上酒精，盛在小玻璃瓶里，再三叮嘱：“不要怕麻烦，吃饭前用这棉团认真擦擦饭碗、汤匙、筷子。出趟差，染上肝炎或其他传染病，这划算么？”此外，她还给我夹带了一小瓶灰锰氧。我一时没会过意来，露出了不解的神色。

“洗脸盆、洗澡水桶许多人用过，有时旅店没有认真消毒。你就多点心眼对那些盆桶消消毒吧！免得染上皮肤病。”边说，一边又给我示范。

“我不信那些盆桶染有病菌或病毒的概率那么高？”

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”她于是唠唠叨叨的数了一串因出差而患上眼疾、顽癣或肝炎的熟人的名字。

到了目的地，为免辜负妻的一片心意，我还是按她的叮嘱办了。同行的朋友知道后都浮出了笑意。这笑，更多的怕是带有赞赏的意思吧，我想。

毕竟是知识分子，读书报的习惯年青时就已养成。平日读报，那些介绍营养知识的小品及食物疗法、健康之道一类的文章，她不但读得细，还用剪刀剪下来贴在本子里，奉行

不悖。譬如日本人用 9 度糯米醋浸泡鸡蛋以治疗动脉硬化病的食物疗法，中医以田七炖瘦肉的治心血管病的做法，她都深信不疑。一定时间，她就要依法泡制，督促我服用。

每回在服用这些防治老年性疾病的食物时，我都不免想起她的一片真心与真情。“人生恩爱原无价”（清华广生），所说的当也就是这种真情吧！

她也喜欢读文艺书籍，特别是那些写女性的书。读完了常常都要发一通议论。我刚刚借回来一本《琼瑶自传》，她很快就阅了一过。可能是生活的坎坷历程有很多近似的地方，她对琼瑶一家抗战期间逃难的遭遇特别关注，由此引发了她许多战时东奔西跑的回忆，从而又联想到一些老师及朋友们在战争期间的际遇，于是这类话题自然成为她说不尽的故事……对琼瑶的恋爱悲欢，她则是同情更多于冷眼旁观的成分，而对琼瑶的成功，她可谓备极赞赏。

“琼瑶是强者，所以她获得了成功。”掩卷之余，对于一个女性中的强人，她作了充分的肯定，从而又不免谈到现代女性的一些不幸，以及她们何以在事业上的磨难特多。

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：“在人生中，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，中年时代的伴侣，暮年时代的守护。”信哉！

1992年 11月 19日

百载乡国驿站

少时，香港从历史教科书给我的印象是与屈辱、苦涩联系在一起。稍长，读鲁迅先生谈香港的文章，不免感到这块地方的晦暗与令人窒闷。但从其他资料来看，它也有过闪烁的一面。作为故国、故乡进出口的驿站，不少人是以此为起点，发挥了自己的才智，到海外去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；四十年代末、五十年代初，不少海外游子又是通过它而圆了投奔祖国、参加革命的梦。我也有过在香港登岸并在那里逗留的经历，尽管这段经历眨眼就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，可它却让我历久难忘。

1927年，鲁迅先生从厦门大学转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，曾路经港岛，后来又几度到香港讲演，得到的结论是：“香港总是一个畏途”。他的学术讲演，“先是颇遭干涉，中途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入场券，收藏起来，使别人不能去听；后来又不许将讲稿登报，经交涉的结果，是削去和改窜了许多。”这就是在英国人统治香港八十年之后那里的言论自由。鲁迅先生在这里看到的是：英国统治者的蛮横，同胞们的备受欺凌与侮辱。有同胞因为偷裤一条，竟受笞刑十二藤鞭；晚上夜行，不但为英警搜身，还被带去警署。一位受过高等

教育的华人，受到英官凌辱，提出申辩，英官无言以对，却仍训斥他：“总之是你错的，因为我说你错。”读书人带着书籍出门，书籍会被指为“危险文件”。报上登出诬蔑鲁迅在广州“因为‘清党’，已经逃走”的文章，他写信去要求更正，却如泥牛入海。香港总督在公开场合演说，大力提倡“中国人应该整理国故”，那潜台词是少讲、甚至不讲政治。（以上见《而已集》：《略谈香港》）鲁迅先生第三回到香港去，更是大触霉头。因为带了一些行李，碰到几个如狼似虎的英属同胞“手执铁签”检查，“箱子的内容倒出，翻搅一通”，包纸撕破，于是一箱书“高出箱面六七寸”。要求不再查第二箱，英属同胞却要索取十块钱。稍有迟疑，他们便继续捣腾下去，“一箱书又变了一箱半，还撕碎了几个厚纸包。”在讨价还价中，十箱书已打开了八箱，“全部乱七八糟”。他还未来得及收拾，茶房又已大声喊：“你的房里查关，开箱子去！”回到房里“铺盖已经掀得稀乱”，一进门，身上的皮夹便被搜了一通；跟着是开提包，把衣服“抖开了十来件，乱堆在床铺上”。其次是开衣箱，因为取钥匙略迟，衣箱的铰链几被英属同胞的铁签所毁。里边的衣服照样被抖乱。另一位狐假虎威的同胞检查网篮，更是肆意破坏，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，掷在地板上，还在茶叶瓶上钻了一个洞。见桌上有一把小刀，竟称：“这是凶器，你犯罪的”。最后鲁迅还是逼不得已献上“十元整封的角子”，才换来“天下太平”。可整个房子已是“烟尘陡乱，乱七八糟”。（以上见《而已集》：《再谈香港》）这就是当年殖民地海关验关的“德行”，让旅客哭笑不得，叫苦不迭。

鲁迅的两谈香港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，1949年中，当